

“后真相”引发的价值共识困境与应对

蒋瑾玢^{1,2} 魏晓文¹

(1.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2.辽宁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1)

[摘要]“后真相”是介于真实和谎言之间的“第三类陈词”。社会结构转型引发的深层次矛盾、后现代主义思潮以及互联网提供的匿名的、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交往方式都是“后真相”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基础。“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传播模式导致了核心价值认同被弱化;情感和个人信念取代真相导致了价值共识的理性基础受到冲击;价值与事实裹挟传播使价值共识被分化。面对“后真相”引发的价值共识困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重塑事实与真相的权威、改进话语方式并强化情感共鸣,是凝聚价值共识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后真相;价值共识;困境;应对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8)12-0056-05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当代中国,全体社会成员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达成价值共识,是化解价值冲突,实现社会安定和谐,引导我们国家走向稳定、有序、持续、上升发展道路的基石。“后真相”具有反权威、去中心化、情绪化的价值传播特点,经由社交媒体已经汇聚成了强大的社会权力,并逐渐生成了新的价值共识达成逻辑。社会价值共识的凝聚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沉重而急迫。

一、“后真相”的缘起与在中国社会发生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指出:“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之中去解释。”^[1]“后真相”孕育于

西方的政治环境,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而这样一个“外来词”能够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亦有一定的现实基础。

(一)“后真相”的缘起

1992年,美国《国家》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批评美国政府在海湾战争中为了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操纵媒体进行有选择性的新闻报道。文章认为,“民众只能了解部分事实,从而生活在一个后真相世界”,这是“后真相”(post-truth)一词首次在大众媒体上出现。2004年,一部描写美国政治生活的著作首次完整地提出“后真相”概念,用以表述介于真实和谎言之间的“第三类陈词”。2016年,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的过程中,出现了政客们借助社交媒体左右事实真相,民众忽略真相,仅以个人立场和情感来支持政见的现象,使“后真相”一词一跃成为西方世界政治评论的热门术语,被《牛津词典》评为当年英语世界的“年度热词”,正式宣告了“后真相”时代的来临。

同“后工业化”“后现代性”等一系列以“后

魏晓文: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美高校价值观教育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6JDSZ3043)、2017年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价值观教育”(项目编号:S201783678)、2018年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发展价值观’的嬗变与‘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研究”(项目编号:L18AKS005)阶段成果

(post-)”字开头的词汇一样,“后真相”具有批判、解构和反思的意味,用来表征与原有现象的割裂态度和逆向趋势。“后真相”一词最初只是一个政治学概念,用来批评和讽刺政府及政客操纵媒体,通过控制情绪和观点的传播诱导舆论走向,从而达到影响政治决策的目的。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后真相”的语义发生了泛化,意指一系列有意或无意遮蔽事实、掩盖真相的社会现象,如虚假新闻、信息泛滥、政客说谎等等。^[2]既包括媒体基于利益需求有选择地发布信息以迎合受众的情绪;也包括社会大众重共鸣轻真相,基于个人情感及价值立场有选择地接受事实。“后真相”用“情感”和“立场”割断了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事实——结论”的逻辑链条,使二者的逻辑关系从“由事实得结论”逆转为“让事实证结论”。“真相”经过无数次的“再阐释”沦为“偏见”的帮凶,要么被故意漠视,要么被主观裁剪。经由社交媒体,大众获得了对真相的解释权,曾经的“权威”被瓦解稀释,人们可以随意歪曲事实而毫不自责,使得“后真相”处于伦理道德的灰色地带,进而引发了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泛滥。

(二)“后真相”得以在中国社会发生的现实基础

第一,由社会结构转型所引发的深层次矛盾是“后真相”萌发的现实土壤。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社会建设已经完备。随着全面深化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原有的利益格局不断被打破重组,由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层流动固化、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引发的社会裂痕悄然加深。“后真相”表面的喧嚣源自于深层利益的纠纷,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价值体系之外的、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小集群性价值诉求,是没有得到适当规范的某种共同利益和共同情感的集中释放。“后真相”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是非理性的,一旦不能得到及时的疏解和回应,仇视、怨恨等负面情绪就会因为一些偶然事件被触动和激发,不顾事实,一味地声讨和斥责,将所有问题粗暴地归咎于社会制度,虚假的正义感使得人们超越真相本身去追求自我认定的“公平”,导致最终结果偏离甚至背离群体原本寻求的利益,引发对核心价值观的抵触和逆反,动摇了价值共识的基础。

第二,愈加泛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后真相”滋生蔓延的思想温床。“后真相”的兴起有着深层次的大众心理与精神文化方面的诱因,其中,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侵蚀难辞其咎,一定程度上为“后真相”的发生起到了思想动员的作用。首先,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被推崇的“理性”、“去中心化”和“反权威性”的特质,撕毁了理性主义确立的价值原则。社会大众通过基于个体价值体验的恣意发声反抗权威话语,草根文化冲击精英文化,要求重置一套自我构建的价值秩序,对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发起挑战。其次,后现代主义主张世界是偶然的、多维的,拒绝接受任何单一的价值,主张多元化、自由性的价值诉求,共享视角的瓦解导致了多元价值取向的对抗和分立,社会大众的价值依归成为难题。最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解构”文化,是一种深层意义上的颓废,这种“只解构、不建构”的思维打碎一切、颠覆一切、消解一切,使得人们走向丧失理想、失去追求,陷入空虚的境地,最终走向价值虚无。

第三,网络技术的全民性应用是“后真相”急速爆发的助推力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普及率为57.7%,其中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互联网提供的匿名的、超越时空限制的大众交往方式为“后真相”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首先,网络空间的相对匿名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以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忽然到来的“自由”散发出强大的魅力,让人们沉醉在无拘无束的世界之中,无政府主义的偏执与狂傲、自由主义的唯我独尊侵蚀着人们的既有价值观念,社会价值共识在“解放”了的言论中被“解构”。其次,网络的跨越时空性为具有相同观点和价值诉求的群体迅速聚集提供了便利条件。在传统的社会交往条件下,主流价值体系之外的利益诉求即使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因这种体系之外的共同性通常处于分散的状态,很难形成气候,以至于难以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后果。但网络技术的全民性应用颠覆了这种状态,历时与共时的双重变奏,激荡出以往现实中不可能结成的社会关系,原来处于离散状态

的多种边缘性价值诉求借此契机迅速汇聚,发酵成某种集体情绪,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催化、幻化为特定的集体行动,挑战既有的价值秩序和主流价值。

二、“后真相”引发的新的价值传播逻辑与价值共识困境

“后真相”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在于它已经生成了迥异于传统的新的价值传播逻辑,引发了合法性、中心化、权威性等基本价值维度的嬗变。“后真相”以后现代主义思潮作为理念支撑和舆论策应,经由网络社交媒体工具系统的放大变形,已然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种游离于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之外的弥散性力量,正在以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方式解构着现有的价值体系,冲击核心价值观念,引发了价值共识困境。

(一)“去中心化”的社交传播模式确立,核心价值观认同被弱化

价值共识达成的标志是全体社会成员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当前,社交媒体已经取代大众传媒,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以“去中心化”、扁平化为特点的新的个体间关系和群体间关系模式已然建立;信息权力的主体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掌握者,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普通大众也开始掌控部分权力,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力量,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由此受到冲击。社交媒体对大众的生活意义远超出了社交本身,是大众获取信息、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途径,舆论主体也实现了从主流媒体、政治机构到普通民众的转变。社交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被动的“一对多”的现状,形成了主动的“多对多”的状态,传播结构也由“纵向”向“扁平”转变。“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们可以随意地对信息进行拼接和演绎,“事实”在再度或几度诠释之后变得面目全非,多元的价值观念在虚实空间转换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使出浑身解数争夺话语权和影响力。价值秩序在不知不觉中变换了调门,大众成为不同价值文化的拥趸者和践行者,核心价值观认同被弱化。

(二)情感和个人信念取代真相,价值共识的理性基础受到冲击

“后真相”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情感和个人信念

取代事实真相成为价值观形成的依据。当多方声音不绝于耳,事件的真相往往难以辨认,此种境况下的公众好比“坐在剧场后排失聪的观众”,对“是非对错”的判断屈从于情感,而非基于理性的探究,大众只是凭借自己的情感神经“借题发挥”。在极度的情感能量推动下,原初对“事件”的自由讨论,逐渐演变成对某种观点或价值取向的强力支持或粗暴打压,以便从中体验短暂的兴奋和愉悦。“在普遍情绪高昂的影响下,我们看到最平庸和老实的自由民成为了英雄或屠夫”^[36]。“人多势众”给了偏激者一种力量感,情感宣泄和恣意传播使得引起热情爆发的价值信念得到强化。当理性和事实变得无足轻重,情感与个人信念成为形塑价值观的主导,价值观的主张和表达就会走向极端甚至难以驾驭。例如,对人们“民主”的情绪化误读就会导致民粹主义价值观和民族主义价值观,虽然二者都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鼓吹提升人民的主体地位,但是其非理性的、极端的民意宣泄,反而伤害了真挚的民族情感。

(三)价值与事实裹挟传播,价值共识被分化

“后真相”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事实与价值夹杂在一起传播。在基于共同需求或相同爱好结成的圈子里,人们讨论、传播的不再是单纯的事实信息,而是已经用观点和立场定了基调、下了是非对错结论的信息,目的是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和附和。传递信息的同时传递价值情感,渗透价值观念,加速了群体内的意见聚合和价值趋同,使圈层内的价值观念得以相互印证而变得愈加“顽固”。人们的视域越来越窄,圈层内人们的“生活世界”不断收缩。抱有相同信念的个人彼此之间抱团取暖、相互印证;信念不同的个人彼此互相抨击,表现为圈层内的个体内在的自我封闭和外在的互相抵毁,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视角分化。另外,信息权力的不当使用也招致了认知偏见,社交分发和算法推荐对具有共同兴趣或利益的群体进行“同质化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形成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亚文化群体。新闻媒体迎合读者的偏好,利用搜索引擎精准推送后台认为的用户希望获取的信息,使受众频繁接触同质信息,陷入类似回音室的信息闭环之中。圈层内的主体被悦己的信息之“墙”所围困,“高墙”之下,不同圈层主体间的沟

通、对话变得极为困难,主流价值观穿越圈层壁垒的阻力加大,社会价值共识被各个圈层切割分化,陷入到“巴别塔”的困境之中。

三、对“后真相”引发的价值共识困境的应对

依据事实真相理性地达成社会价值共识,是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实现个体内心和谐的基本条件。只有坚持凝聚共识、积极引导、科学治理、情理交融的理念,建构更为开放、包容的新秩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理想内化为社会大众的自觉追求,才能有效应对“后真相”问题,规范“后真相”力量。

(一)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共同的利益基础

价值共识的物质基础是共同利益。满足共同的需求、实现共同的利益是社会大众最终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187}。“后真相”的目标直指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被“后真相”推到风口浪尖的情绪化舆论,往往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凝聚社会价值共识,需要积极探寻大众的利益共同点,不断拓展共同利益,把宣传教育和现实行动有机结合起来。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5]。

第一,要做好民生工程这道大题。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引起社会价值情感的波动,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淹没在情感与情绪的泡沫之中。要搞好基本民生,兜住底线民生,关注热点民生,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通过民生工程得民心,妥善解决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各种需求矛盾。第二,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要想实现社会价值共识的有效凝聚,需要国家执政理念进一步人性化,统筹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努力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

(二)强化情感共鸣,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

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价值共识的核心内容。价值认同包括认知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等环节,其中情感认同是实现“知行合一”的关键。具有相似情绪和心态的人们可以在相互影响中建立起强有力的情感纽带,积聚起强大的情感能量,一起分享、互动直至产生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标准。因此,感染性、从众性、情感化的认同心理既然能够沦为引发“后真相”的不确定因素,同时也可以成为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突破口。为此,可以通过强化情感共鸣来完成移情理解,通过持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染力触动大众情感,使大众发自内心地肯定、赞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实现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情感认同。

第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6]价值观传播的情感触发点是传递故事,用人民自己的故事进行新时代价值理念的呈现和传递,表达真情实感,引起共鸣。第二,要深耕主题立意。坚持团结稳定原则,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唱响正气之歌,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形势宣传、成就宣传、典型宣传、热点引导和舆论监督中,用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宣传报道,激发情绪共振和情感共鸣,不断巩固壮大健康向上的主流思想舆论。第三,要寻求文化滋养。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养分,唯有用民族文化的养料细心灌溉,才能培养出真正配得上中国文艺气质和中国文化境界的优质内容。通过民族文化带来的高尚审美情感,让人们对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产生崇高的敬畏之情,对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情感共鸣。

(三)构建规范、清朗的网络媒体环境,重塑事实与真相的权威

价值共识的依据是对现实生活的共同理解。“凝聚共识工作不容易做,大家要共同努力。为了

实现我们的目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4]人们借助社交传媒间接接触现存的世界,既按照社交传媒的描述去感知世界,又按照社交传媒的解释去理解世界。权威信息源的缺位失声,导致人们看到的现实生活失真,价值共识的凝聚必定受到冲击。因此,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5]

第一,建立公众舆情反馈机制。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网络社交媒体进行舆情预测和研判,准确对公众接触信息时的反应、态度以及行为作出判断和区分,及时有效地选择信息传播的角度和重点,划分不同的受众群体,对传播机制作出适度的调整,弱化偏见式归因,正确引导大众情绪。第二,扮演好信息传播者和社会守望者的角色。要科学规范信息生产和传播,尽快建立“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格局,用正面声音挤压负面舆论的话语空间,用客观的理性声音化解网络戾气。发挥“红色”意见领袖的作用,对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质账号及内容进行具有官方性质的推荐;充分发挥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专家智库以及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的作用,打造清朗网络空间,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加快建立网络实名制与信息信用制,规范个人账号的注册和营销,限制养号及群发,健全新媒体企业的市场准入制度和认证机制,加强对不良信息规制,依法查处违法网站和网络账号,严厉整治网络直播平台。

(四)改进话语方式,破除达成价值共识的圈层藩篱

价值共识的达成手段是协商。不同的个人或群体通过对话和协商形成对价值观的统一信念。“后真相”造成的社会共享视角的削弱乃至瓦解,使得每个人只会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去理解事物,这种固执己见和无休止的分歧,只能依赖无障碍的对话甚至争论才能解决。“没有了对话,就没有了交流,没有了交流,也就没有真正的教育”。^[6]只有通过对话交流达成开放性的意义共建和升华,通过商谈论辩达成具有包容性的融合和共识,才能最终超越立场、视角、利益的偏颇,从而达成普遍的价值共识。

第一,要合理设置话题。凡是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转化为群体意识的议题,我们都要积极开启,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准确把握思想共鸣点,找到大众疑惑所在、情感所需、利益所求的兴奋点,既讲清“怎么看”,又说明“怎么办”。第二,要抢占话语先机。善于先声夺人,通过早谋划、早预断、早发声、早造势增强话语的主动权。关注热点问题,敢于发声、善于发声,宣示立场观点、以正视听,充分彰显事实的力量、道义的力量。对焦点问题不回避,勇于同各种“异质话语”直接对话,澄清模糊认识、匡正失范行为,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第三,要形成亲民的话语风格。企鹅智酷调查(2017)的数据显示,接近60%的用户偏好极简化、个性化、娱乐化的表达方式。因此,好道理要说得出、传得开、叫得响,就要不断改进传播理念和传播技巧,把“我们想讲”变成“受众想听的”,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我们想讲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庞金友.网络时代“后真相”政治的动因、逻辑与应对[J].探索,2018,(3).
- [3] [美]兰德尔·柯林斯.互动意识链[M].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更好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N].人民日报,2018-08-23.
- [6]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人民日报,2014-10-15.
- [7]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
- [8] [巴西]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的教育学[M].顾建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吴宁宁]